

《我们》：遍布“精神之熵”的反乌托邦世界

尹霖

(中国科普研究所, 北京 100081)

提 要: 反乌托邦文学为我们展示了一个荒诞无稽、阴森可怖的世界。其目的在于警示人类,一旦理性超越客观规律,把意愿强加给历史,把空想作为现实目标执著追求,并忽视本应是最终的关怀对象的人类个体的时候,就必然导致某种非理性的“疯狂”,乌托邦的美好就必然变为反乌托邦的恐怖。作为问世最早的第一部反乌托邦经典,扎米亚京的《我们》通过三组对立概念所代表的思想冲突,体现了作家对理性至上、制度至上、蔑视人性、践踏人性的极权秩序的批判,这三组概念分别是熵与革命、幸福与自由、共性与个性。

关键词: 《我们》; 反乌托邦文学; 幸福; 自由; 共性; 个性

中图分类号: I109.9

文献标识码: A

乌托邦文学是文学史上最为宝贵的财富之一。它是人们在反思赖以存身的现实社会之后,针对未来展开的一系列美好设想,作品中不仅寄托了人们希图改变现实的改革批判精神,也表现了人们跳脱现实、跻身于精神乐园的想象力度。此类作品着力描绘一个理想社会,那里不存在现实社会的一切黑暗与丑恶,人们生活在和谐美满的世界之中。唯美主义者奥斯卡·王尔德曾经说过:“一幅不包括乌托邦在内的世界地图根本就不值得一瞧,因为它遗漏了一个国度,而人类总在那里登陆。”¹

然而,乌托邦文学中描绘的完美社会是否真的能够实现?当历史推进到20世纪之际,人们似乎突然从对乌托邦的沉迷中清醒。他们看到的是,现实的发展僭越了美好理想,“乌托邦”的和谐渐渐演变为“反乌托邦”的荒诞。于是这样一种文学应运而生:它是对乌托邦文学的讽刺性模拟。当后者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和谐美满的未来社会,并鼓舞我们去实现这一理想目标的时候,它却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与之相反的荒诞无稽、阴森可怖的世界。反乌托邦文学的目的在于警示人类,一旦理性超越客观规律,把意愿强加给历史,把空想作为现实目标执著追求,并忽视人类个体本应是最终的关怀对象的时候,就必然导致某种非理性的“疯狂”,乌托邦的美好就必然变为反乌托邦的恐怖。

在反乌托邦文学世界中,叶·扎米亚京写于1921年的《我们》可算其中翘楚。它和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1948)、阿·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1932)一起被称为世界文学史上具有经典意义的三部反乌托邦作品。作为问世最早的第一部反乌托邦经典,《我们》不论从思想内容,还是从艺术形式上都突出体现了这一文学体裁的基本特征。小说以书信体的形式写成,通过男主角的讲述描绘了一个科技发达,秩序井然,但却扼杀人的个性和自由的未来幻想世界。作家以一个生活在反乌托邦世界中的内在感受者的视角,深刻而有预见性地揭示了人性在极权秩序下遭受践踏的境况。

《我们》完成后先以手抄本形式流传。皮里尼亚克、索洛古勃、布尔加科夫等人都曾阅读，德尼亚诺夫、什克洛夫斯基、沃隆斯基等还撰写过评论文章，到1924年小说被禁之前作家曾多次在聚会上朗读自己的作品。人们在对扎米亚京写作手法和语言技巧赞叹的同时却认为书中的讽刺批判似乎言之过早，有空穴来风之嫌。小说于1924年首先在纽约以英译本公开发表，继而于1927年在巴黎出版的《俄罗斯意志》杂志上发表了部分俄文片断。50年代中期，小说俄文本由纽约的“契诃夫”出版社出版，马上引起了西方学者的注意。当时苏共二十大召开，个人崇拜遭到批判，小说于是成为西方世界阐释苏联社会的一个文本。而在苏联国内，直至1988年，小说才首次被发表在杂志《旗》的第4期和第5期上。

《我们》既是三部曲中完稿最早的，其命运也是最为乖舛的。它以丰富的想象对那个时代的激进理想进行了艺术加工，以讽刺模拟手法达到对反乌托邦世界的揭露和批判。在扎米亚京这位“新现实主义”倡导者的笔下，小说内在的深刻意义通过一个光怪陆离却又似曾相识的世界被揭示出来。当时这部小说不幸被打上了“反对革命”的标记，被当局书刊审查机构认定为有问题的作品，禁止出版。《我们》中究竟包含着怎样的意义符码，使得它具有如此的文学地位却又遭受如此的命运？

小说以记事的形式写成。它叙述了一个极具幻想性的离奇故事。距今一千年后，宇宙中存在着某个“大一统王国”，它是地球上的人类经过“伟大的二百年大战”后建立的唯一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四周环绕着绿色大墙，房屋都用玻璃制成，四处是护卫局的密探，居民生活在毫无隐私的状态中。“大一统王国”的居民们没有姓名，而是用字母加数字的“号码”命名，元音是女性，辅音是男性。“号码”们的工作、生活、思想全归统治者“大恩主”支配。他们按“守时戒律表”中的规定生活：用餐时必须按食堂的节拍器速度嚼50次后才能咽下石油合成的食物；饭后排成四人一列按“大一统王国”进行曲的节奏散步；全体“号码”们都穿统一的灰蓝色制服，配上金色的号码牌；只有在规定的时间内他们才可凭粉红色的票子放下窗帘进行性事活动。在“大一统王国”中，一切自然力量和本能都被认为是偏离了轨道的犯罪，尤其是自由的思考。这个国家致力于“把人从自由中解放出来”，在“没有自由的幸福”和“没有幸福的自由”之间，“号码”们只能二者择一。小说的男主人公П-503是数学家，正负责建造宇宙飞船“积分号”，以便驾驶它去拯救尚处在“野蛮的自由状态”的邻国，使之成为良性理性的管辖之地。然而，在“大恩主”的铁腕统治下，王国内依然存在着顽强的反抗者，女主人公I-330便是他们的领袖。在她的影响下，П-503内心深处的人性开始复苏。后来，在“一致同意节”重新选举“大恩主”时，I-330等一批“靡菲”们竟然反对永恒的统治者“大恩主”，从而引起一场混乱。“靡菲”们试图登上“一统号”飞往绿色大墙之外，但由于有人告密终致事败。小说结尾极具悲剧性：“救世主”宣布对“号码”们进行“幻想摘除”的手术，П-503也被迫接受。摘除了思想的男主人公最终麻木地看着自己心爱的人被关入气钟罩中受刑处死。

沃隆斯基曾经这样评价这部小说，“扎米亚京写了一部带有抨击性的作品，它不是针对共产主义，而是针对国家的、俾斯麦主义的、反动的、里希特主义的社会主义。他将自己的“岛民们”改头换面，把伦敦和杰斯蒙德市的最主要特征以及《岛民》的基本情节纳入这部小说，这样做并不是毫无道理的。”²1932年，扎米亚京本人在谈到《我们》的构思时则指出：“目光近视的评论家在这部作品中只看到政治讽刺，这当然是不对的。这部小说是一个关于危险性的信号，预告人和人类会受到无论是机器还是国家的过大权利的威胁。几年以前美国人在谈到我的小说的纽约版时，并非毫无缘由地从这面镜子中看到了他们自己的福特体制……”³笔者认为，这两种有代表性的见解恰好指出了答案所在。《我们》之所以遭禁，是由于当时社会政治文化氛围下人们对它的误读，小说被认为是一个夸张的政治寓言。而《我们》的深刻正在于此，它并非是一部纯意识形态性的批判之作，而是扎米亚京依靠知识分子的敏锐嗅觉和逻辑想象推演历史的结果。小说旨在警告人们，在理性至上导致的制度僵化、

极权统治情形下，人作为个体存在将会遭到非同一般的蔑视——从行为到思想的自由均遭剥夺，人之为人的权利不复存在——从而导致人类陷于黑暗痛苦的世界之中。作家将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融为一体的写作手法使得小说行文给人以游离破碎、晦涩含混之感，然而一旦驱散这些萦绕的迷雾，我们便能更加深刻地体味扎米亚京对笔下这一极权世界的批判。在笔者看来，这一批判主要是通过三个层面来进行的，每个层面包含着由两组对立概念之间的思想冲突，它们分别是熵与革命、幸福与自由、共性与个性。

1 熵与革命

熵与革命是扎米亚京小说中两个相互抵牾的重要概念，它们代表了两种社会状态。熵⁴代表着理性和静止，而革命则代表非理性和运动变化。扎米亚京在《明天》一文中谈到熵：它“无处不有，无所不在；它是无穷尽的，最后的革命是没有的，最后的数字是不存在的。社会革命只不过是无穷尽数之一……”（叶·扎米亚京 2000：120）在扎米亚京看来，经历过历史巨变的国家恰如冷却的星球，它那炙热的岩浆已经凝固。国家是不可能无止境地依靠理性的秩序来维护稳定的，社会必须不断经历变革才会进步。任何固定静止的状态最终都会导致腐化堕落。这种类似熵的静止不变、僵化保守状态是作家所要批判的反乌托邦世界的弊端之一。

《我们》中所描写的“大一统王国”就是理性的造物，它是一些概念化公式的具体体现（例如小说中用数字规定的各种生活规律），如同柏拉图的理想国，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培根的新大西岛，卡贝的伊加利亚共和国，傅立叶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空想社会主义大厦一样，都是乌托邦主义者通过理性思辨所建构的人类理想的生存环境。它们是人类对理性力量，对建立世界科学秩序的可能性，对幸福公式的存在抱有盲目信仰所产生的乌托邦梦想。20世纪是人类理性繁荣发展的时代，科技和革命令人类拥有了前所未见的进步，而且使得人们相信命运终能自主，能力可以无限。或许可以说，对理性的过分信任导致20世纪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为血腥的时代，因为极端的理性至上主义藐视个人，践踏人性，认为只有严酷的管理约束才能令人类产生最大的能量，试图用巨细无遗的制度化管理规范人的行为，甚至发展到约束人的情感、个性、艺术创造等等，终于在制度化的道路上走向了偏离。

所有乌托邦作品呈现的都是一幅和乐美满、平静安宁的美好景象，这也是人类共同的生活愿望。在小说中，“大一统王国”依靠绿色大墙隔绝了与外部世界的一切联系，使用一切手段坚定地维护着国家的稳定和平静，这一切都是通过数字化、机械化的理性管理实现的。“号码”们散步时“四人一排”，住在透明的“平行六面体居室”之中，所有人咀嚼食物50下后才能下咽，做爱要用“粉红票子”登记，而且每个号码被登记后都有履行职责的义务……每个号码的个人意识已经高度统一，他们已经学会欣赏这种机械之美了。音乐、舞蹈、诗歌……这些最需要人的灵感、个性和创造力发挥的艺术领域也已完全纳入理性的控制范围内，从而丧失了灵动的美感和巨大的激情。男主人公甚至认为，“大一统王国”的舞蹈之所以美，正是由于它是一种“绝对的审美服从”，是一种“理想的非自由状态”，也就是说，它是一种“非自由的运动”。国家的音乐“流涌着泰勒·马克洛连公式的综合和音；震荡着毕达哥拉斯的全音二次方的低沉浑厚的转调；低回着滞缓震荡的忧郁的旋律；还可听到随着休止的弗朗和费谱线条而变幻的（行星光谱分析）鲜明节奏……”它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的规律坚如磐石”。诗歌则应是能够带来效益的国家工具，每部诗歌都有自己的职能和功用：《数学诗歌》是为了让孩子们真诚地爱上四则算术；《玫瑰花刺》用来歌颂护卫局人员对人们的监视保护；《大恩主日日颂》赞扬号码们的忘我劳动；还有《法庭判决书萃集》、《性事卫生诗抄》……如果诗歌真的如此演变，不知柏拉图还会不会将诗人们驱逐出“理想国”。为了达到对“号码”的完全控制，“大一统王国”甚至要求他们接受“幻想摘除”手术，因为没有幻想也就不会有创造和变革，不会有所谓的“欲望”和“痛苦”。那些经过手术的“人”没有腿脚，取而代之的是沉重的、固定的轮子，由一条无形的传动装置牵引转动。他们已经

不再是人，而是“人形拖拉机”。僵化腐败的气息悄无声息地侵蚀着“大一统王国”表面的宁静，这就是扎米亚京为我们描绘的“乌托邦”国度。

如同没有最大的数一般，在作家看来，最完美的制度也是不存在的。需要运用暴力来贯彻的秩序更加如同熵的世界，它的“规律冷漠，……如同那冰冷无垠的星际空间”，它“无法再燃烧，它只是发热，变暖，凉下来”，最终归于死寂。而“世界发展只能寄托于异教徒，异教徒耶稣、异教徒哥白尼、异教徒托尔斯泰，……今天否定了昨天，也是明天的否定对象，这就是辩证的通途，像一个宏大的抛物线把世界带入无限。昨天就是论题，今天就是反命题，明天就是统一。”（叶·扎米亚京 2000：50）因此，扎米亚京创造了一群异端者，一群狂热的人——“靡菲”。他们以《浮士德》中魔鬼化身的靡菲斯特来给自己命名，以敢于挑战大恩主的神威自豪不已。他们认为“世界上有两种力量：熵和力，一种力量导致舒适的平静和幸福的平衡，另一种导致平衡的破坏，使事物永远处于无穷尽的痛苦的运动之中。”（叶·扎米亚京 2000：156）“大一统王国”的叛逆者们是永远的异教徒。对他们而言，“生活”和“变化”是同义词。他们以生命和自由的名义极力夸赞一切未知的、非理性的、不可预料的事物，拒绝接受现存秩序的固定不变。这就是扎米亚京对于世界的思考，他用对“大一统王国”这个“乌托邦”内在静止和停滞的讽刺来表达自己的反乌托邦意识，即革命的、永不怠惰的精神。

2 幸福与自由

多少年来，乌托邦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幸福生活的代名词。提起它，自然会引起人们关于自由、平等、富足这些概念的非凡想象。在乌托邦的世界中，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并行不悖的。但在《我们》的反乌托邦世界里，似乎存在着两种不可兼得的状态，那就是自由和幸福。“大一统王国”中的诗人 R 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不必费脑筋去分辨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因为一切都很简单，像天堂一般美好，像儿童一样单纯。大恩主、机器、立方体高台、气钟罩、护卫局人员——这一切都代表着善，代表着庄严、美好、高尚、崇高和纯洁。因为这一切捍卫着我们的不自由——也就是我们的幸福。”（叶·扎米亚京 1998：60）诗人本应是自由灵魂的歌颂者，是依靠情感与直觉创作的人。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曾经提出应当驱逐诗人的想法，因为在他设想的理性统治的国度内已没有诗人的用武之地。但是，“大一统王国”中的诗人早已没有了激情与梦想，只有精神的怠惰和麻木。前面这段话一语道出了这个反乌托邦国度内最明显，也被认为是最“公正”的命题：不自由等于幸福。这样的断言破坏了乌托邦理想为我们织就的美丽图像，也和先天预设在我们认知领域的对于幸福和自由的理解发生了抵牾。这个等式是怎样成立的呢？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在 19 世纪就于《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借伊凡之口给出了答案。

《宗教大法官》是伊凡给弟弟阿辽沙讲述的一个故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中对自由的命题进行了拷问。他虚构了一个宗教大法官的形象，对《福音书》中基督在旷野考验中拒绝了魔鬼三次诱惑的情节做出了自己的诠释。第一重诱惑是奇迹的显现。基督首先拒绝了撒旦让他将石头变为面包的建议。如果他这样做了，就会使人们因感激而变成听话的羊群。在这里，面包其实代表着一切的物质享受，神迹的显现就意味着许诺人们物质上的保障。由于人性的弱点，人类随时愿意卸下精神生活的重负，而去追求物质生活的享乐。他们甘愿交出自己的灵魂，以看不见的自由去换取物质生活的富足。但耶稣基督不愿这样做，因为他认为，人活着不仅仅靠食物。他也不愿通过神迹来使人臣服，因为真正的信仰乃是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第二重诱惑是神秘。耶稣基督拒绝通过从殿顶跳下而不死来证明自己上帝之子的身份，因为一旦这样做了，就证明他对上帝之父的信仰已不再坚定，而要通过检验来证明。那么，这信念必将在试探上帝的瞬间崩溃。第三重诱惑是权威。基督拒绝接受武力的权杖，以力量来征服世界。而魔鬼告诉他，人类正需要一个偶像、一个权威来作为自己的归属，因为独自背负真正的自由实在是令普通人不堪重负的事情。人们宁愿交出自由，用它来换取思想上的

偷安。宗教大法官讲述的故事想要说明，人们对于上帝赐予的真正自由其实是恐惧多于渴望的。“因为从来对于人类和人类社会来说，再没有比自由更难忍受的东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 1999：378）由于天性的软弱，大多数人其实无力独自对抗生活，因而他们对选择的自由弃如蔽履。

基督拒绝诱惑是因为他知道，上帝赐予人的自由其实是最终的也是惟一的自由，是绝对的自由：既有信仰的自由，也有不信仰的自由；有选择的自由，也有不选择的自由。他拒绝以奇迹、神秘和权威征服人类，虽然他明知，只要拥有这三种力量，就可以“永远征服和俘虏”世人的良心，使他们交出自由，得到“幸福”。基督希望人类自主地做出对善恶的选择，自主地跟从上帝，这才是上帝赋予人类的绝对自由。然而，宗教大法官以残酷的事实向他证明，自由乃是人类无福消受的奢侈品：人类由于平庸无知和粗野不驯，既难以承受苦难又不辨上帝的真理，甘愿抛弃真正的自由。他们宁愿为了“建立在奇迹、神秘和权威上面的”所谓幸福而出让自己享有自由的权利，“因为他们又像羊群一般被人带领着，从他们的心上卸去了十分可怕的赐与，给他们带来了那样多可怕的赐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1999：384）人类天性的懦弱需要权威的奴役和摆布，否则他们就会因为完全凭借自身的力量进行选择而变得痛苦不堪。宗教大法官认为，寻求一个无可争辩的崇拜对象，将自己与生俱来的自由的重负交给他，一劳永逸地得到心灵的平静和肉体的安逸，这是人类懦弱怠惰天性的根本趋向。人类虽然渴望自由，但对于不可知道路的恐惧却更为强烈。他们像羊群一样需要牧者的保护和引领，需要感到明确的秩序和目的。宗教大法官深知，只有通过奇迹、神秘和权威，才有可能为意志薄弱的人类建立起一定的生活秩序，令他们无须过多思考地生活。也就是说，在宗教大法官看来，普通人的自由和幸福是不可兼得的，要么交出自由，换取无需思考和选择的幸福，要么得到自由，同时也陷入选择的迷惑、欲望的挣扎、心灵的痛苦之中。在这样的情形下，宗教大法官甘愿代替人们承受这种“自由”的痛苦，他愿意通过权威的树立和权力的掌控来实现自己保障人们普遍获得幸福的许诺。宗教大法官的理论为独裁者的专制给出了最“合理”的注解。他将人性的弱点作为执行自我意志的保证，为个人意志的实现打出给众人造福的幌子。

对照之下可以看出，《我们》中“大一统王国”对“号码”们的统治正是建立在人类懦弱天性中对于绝对自由的逃避态度之上的。这种精神上的自甘堕落已经成为每个“号码”的内在特征。小说男主角对于“大一统王国”秩序的敬仰和崇拜就是表现之一。他不仅无时无刻不在赞美像机器一样精准运行的国家生活制度，甚至还渴望，国家机器可以将仅剩的一点点私人时间都纳入庞大机械的运转轨道，这样一来，他自己就可以完全不用承担任何自由所带来的无所适从的烦恼和痛苦了。不仅如此，精神上的奴性已经深入其骨髓，当感到“背后站着一个人天使般的护卫局人员时”，他才能真正“感到十四行诗《幸福》的魅力”。对于“限制”的存在（这也是一种不自由的表现），Д-503 更是感觉到欢欣鼓舞：“我不怕‘限制’这两个字，因为人最高理性活动的目的，就在于要对无穷大不断的限制，在于要将无穷大化为灵活方便的、易于接受的微分。我热爱的数学的无与伦比的美也正在于此。”（叶·扎米亚京 1998：64）他将数学的精确和精神世界的受限等同起来，对自己静止不变的生活状态沾沾自喜。I-330 曾经尖锐地指出：“幸福……幸福是什么？愿望都是令人痛苦的，对吗？显而易见，当你没有任何愿望，连一点要求也没有的时候，你就是幸福的。我们直到现在还给幸福打正号，这是多大的错误，多么荒唐的偏见；应该给绝对幸福打上负号——神圣的负号！”（叶·扎米亚京 1998：175）愿望所带来的痛苦正是 Д-503 之流所要逃避的，因为有了愿望，就可能面临选择的为难、责任的负担、失望的遗憾……但对于 I-330 等摩菲来说，有欲望的自由所带来的快乐远远超过了争取自由过程中的痛苦，因此他们不惜用生命来捍卫这种自由。

自由和幸福本是不相矛盾的概念，但在反乌托邦国度中，独裁者以人性的软弱和缺陷为

前提，将二者的关系解释为非此即彼的关系，并使用强制性的手段剥夺人的自由，赋予他们自己理解的幸福，以集体的名义压制人性中最基本的渴望，从而造成人们奴性的心理。至此，想要在人间建立“尘世天国”的乌托邦梦想就被强力意志的独裁所取代。无怪别尔嘉耶夫曾经说过：“乌托邦总有极权性，而极权主义在我们这个世界的条件下总有乌托邦性。最主要的问题，自由问题，与此相关。……自由以生活未被彻底控制和合理化以及生活中有应该被精神的自由力量所克服的恶的存在为前提条件。”（尼·别尔嘉耶夫 2000：113-114）独裁者诱使人将自由选择的能力交出并归为己有，同时许诺人们以自己理解中的“幸福”，如此，乌托邦在蓄意的扭曲下走向了反面。难怪有研究者对扎米亚京的艺术直觉感到惊奇，因为“当这些由虚伪理念构成的体系刚开始僭越大众，扎米亚京就预见到了这一做法将会导致的严重后果，看到了人的心理中“驯顺”的“潜能”，看到了思想解放的道路有多么痛苦，看到了在人对幸福与正义的追求背后所隐藏的虚幻性又是多么的难以琢磨。”（E. Скорospelова 1990：8）

3 共性与个性

《我们》中塑造了一个“大家”和“我”都统一于“我们”的一统王国。个体的人已经抽象化为一个个“号码”，不再拥有体现个性的名字，他们从行为到思想都整齐划一，总是以整体的形象出现。男主人公日记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人称代词不是单数的“我”，而是复数的“我们”。在这种大一统的背景下，小说中刻画了两种基本的情节冲突：一是以 I-330 为首的摩菲们谋求推翻大恩主的极权统治，二是男主人公在对 I-330 产生感情后，人性开始复苏，内心不断挣扎。可以认为，摩菲们和处于人性觉醒时期的 Д-503 不再是大恩主极权体制下的“号码”，而是有血有肉的个体。他们的反抗挣扎其实可以归结为反乌托邦世界中共性与个性的冲突，扎米亚京正是意欲借此来批判以集体的名义忽视、践踏个体权利的行为。

在小说中，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呈现出某种程度的对立，表达了作者不赞同为了共性的需要而消除个性存在的观点。扎米亚京在小说中通过反讽的手法表现出“大一统王国”高度集中的铁血制度的残酷和无情。所有号码都住在透明的城市里，没有任何私人活动的空间和时间，号码们从事任何活动都要结伴而行。大恩主熟练的铁手、铁指和护卫局人员训练有素的眼睛是号码们幸福生活的保障。主人公负责设计的“一统号”飞船要为其他星球的未知生物送去“数字般精确的幸福”，让他们和“大一统王国”的号码们一样，处于“理性的良性桎梏”之下。在这个看似实现了乌托邦理想的国度里，属于个人的、私密的东西已经不复存在，只剩下千人一面的“我们”。号码应该严格按规律办事，任何情感的表露都会被认为是患病的表现，对他们最严厉的批评就是把他们看作一个“人”。在这样的制度下，人们不再独立思考，他们寄生于一切既成的东西：固定的思想、感觉、物质和精神模式，人被剥夺了寻找和发展的渴望，这是个性发展最主要的品质。“我”的意志被“我们”的意志所取代，而“我们”的意志实际上屈从于国家独裁者的指令。这时，乌托邦的宏大梦想就被巨大的失望所替代。人们觊觎普遍幸福的保障，却忘了大众是由单个的人组成的。极端的集中统一必定会从某种程度上消除人之为人的自然本性，而这是不符合人性本质的。因此，肯定会有人意识到自己的不幸并奋起反抗。这时，对乌托邦理想的失望就会使得人们对极权思想和统治者的臣服变得不情愿，他们对美好目标的热情也会冷却。当强制统一超过一定限度时，哪怕它的出发点再美好，也不一定会符合每个人的需要，因此也达不到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共同幸福，乌托邦由此转向反乌托邦。

其实，这种共性与个性的关系问题在革命初年的文学作品中早已产生，这些作品洋溢着难以抑制的集体主义豪情和乌托邦式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表现出一种共性突出，个性隐退的新时代文学主题。例如，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一亿五千万》就以特有的夸张表现了个人消融在群体之中的图景：“我们千百万、/千百万劳动人民，/千百万工人和职员来到这里。/我们从住宅，/我们从仓库、/从大火烧得通红的市场来到这里”，“看哪，/俄罗斯/不是衣衫

褴褛的穷光蛋，/不是一堆破瓦烂砖，/不是一片断井颓垣——/整个/俄罗斯/就是一个伊万。/他的/手——/涅瓦河，/脚踵——/里海草原。/向前去！/向前去！向前去！/不是走，而是飞向前去！”（马雅可夫斯基 1984：184，192）在豪迈的诗句中，国家民族和个人融为了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然而，这种万众一心摧毁旧世界、建立新秩序的革命豪情逐渐被加入了新的内容：因为发现由个体聚合而成的整体拥有巨大的威力，由此开始对个人的微薄力量变得不屑，甚至无限制地要求压制个人的需要。沃隆斯基在《文学报》曾撰文写道：“在伟大的社会斗争中必须要成为狂热的人，这意味着：残酷地压制一切发自微小的本能的、个人的心态，因为它暂时是有害的，妨碍斗争，妨碍胜利，一切都必须集中统一——只有那时才能得胜”。⁵这段话很明白地阐释了那个时代的人们在革命理想的感召下，对个体与整体关系的看法。

众所周知，在乌托邦中，当权者对社会的组织建构是以广大人民的意愿与之相契合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国家的意志是大众意志的完全体现。然而，这只是一种理想情境，实质上，个体总是有差异的，一旦社会的改造要以个性的消隐为代价，又会出现怎样的情形呢？自诩为“异教徒”的扎米亚京在《明天》中毫不隐讳地说道：“昨天，有沙皇也有奴隶；今天没有了沙皇，但奴隶仍然存在；明天只有帝王。我们为了明天的自由人，像帝王一样的人前进。我们曾经经历了压制大众的时代，我们正经历着以群众的名义压制个性的时代，明天会带来以人的名义的个性解放。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令人们关注战争物质、日期、数字。为了星期六把人都忘记了，我们想提醒另外一点：星期六是为了人们。”（叶·扎米亚京 2000：51）在作家看来，“以群众的名义压制个性”的时代和“压制大众”的时代同样不属于“明天”。这一点正是扎米亚京想要通过《我们》让读者去思考的问题。

“有生命的文学既不是按昨天的钟点，也不是按今天的钟点，而是按照明天的时间存在。”（叶·扎米亚京 2000：51）扎米亚京在 1923 年这样写道。也许正是由于作家持有这样的观点，《我们》才于遭禁近 70 年后终能重返故土，获得它应有的尊重和认识。也许在小说创作的年代，人们在革命激情的鼓舞下，的确难以辨别现实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之间的差别，才会延误了发掘这一瑰宝的时间；也许历史正是要通过小说乖舛的命运来突出作家敏锐的洞察力和前瞻性。《我们》是作家立足于时代现实，将艺术想象和哲学思考结合起来，对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提出的警示。扎米亚京对于人类在追寻乌托邦理想的道路上可能会行进的方向做出预测，并通过描绘这一理想的最终实现形式，塑造了一个令人发指的反乌托邦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类非但没有如期望的那样得到美满幸福的保证，反而使个性自由受到了极度的压抑。作家对这样一种高度统一的社会、国家制度能否为人类带来最初追寻的幸福产生了疑问，并把这种疑虑体现在自己的作品中，以供后人思考。卡尔·波普尔在对乌托邦的批判中曾说：“乌托邦主义者试图实现一种理想的国家，他使用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蓝图，这就要求一种少数人的强有力的集权统治，因而可能导致独裁。”（卡尔·波普尔 1999：295）可见，乌托邦理想固然尽善尽美，可是如果将其推而广之作为某种社会生存的固定形式，那么，在其实现的过程中，则有可能会导致不良的后果。追寻乌托邦梦想是否只为人们带来积极正面的结果，或者这一理想是否真能将人类社会引入美满之境——扎米亚京早在上个世纪就已提出了这个疑问。

附注

- 1 转引自罗兰·费希尔：《乌托邦世界观史撮要》，陆象淦译，《第欧根尼》1994 年第 2 期，第 1 页。
- 2 转引自 Б. Ланин, М. Боришанская. Русская антиутопия XX века. М.: ТОО «Онега». 1994. с.15.
- 3 转引自薛君智：《回归——苏联开禁作家五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 年，第 142 页。
- 4 热力学系统状态的单值函数。物理学意义上的熵就是不能再被转化为功的能量的总和。最大的熵指

的是能量的最终平衡状态，这时能量差别趋向于零，最终归于永恒的死寂。

5 转引自薛君智著：《回归——苏联开禁作家五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142页。

参考文献

- [1]Ланин Б., Боришанская М. 1994 Русская антиутопия XX века[M]. М.
- [2]Скороспелова Е. Б.1990 “Возвращение” [A]// Замятин Е.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C]. М.
- [3]尼·别尔嘉耶夫 2000 精神王国与恺撒王国（安启念 周靖波译）[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4]卡尔·波普尔 1999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陆衡等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5]马雅可夫斯基 1984 150, 000, 000（马雅可夫斯基选集第二卷，余振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6]陀思妥耶夫斯基 1999 卡拉马佐夫兄弟（耿济之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7]薛君智 1989 回归——苏联开禁作家五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8]叶·扎米亚京 1998 我们（顾亚玲、邓蜀平、刁绍华译）[M]，北京：作家出版社。
- [9]叶·扎米亚京 2000 明天（阎洪波译）[M]，北京：东方出版社。

We: An Anti-Utopian World with “Entropy of Spirit”

YIN Lin

(China Institute for Science Popularization, Pek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Anti-Utopian literature describes for us a dark, terrific world to warn the mankind that, once rationality overrides objective rules, good intentions are imposed on history, fantasy is being pursued as real target, and individual person which should be the final object to be concerned is being neglected, certain non-rational craze will appear, and utopian glory will be changed into anti-utopian terror. Zamyatin's *We* is the first anti-utopian novel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The criticism of the writer on the highly systematized country mode and supremacy of rationality is understood through analysis on the conflict of three pairs of concepts, they are: entropy and revolution, happiness and liberty, commonness and individuality.

Key words: *We*; Anti-Utopian literature; happiness; liberty; commonness; individuality

收稿日期: 2007-08-21

作者简介: 尹霖(1975—), 湖南株洲人, 中国科普研究所科普理论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博士。主要研究方向: 科普创作, 国外科普。

[责任编辑: 刘 锟]